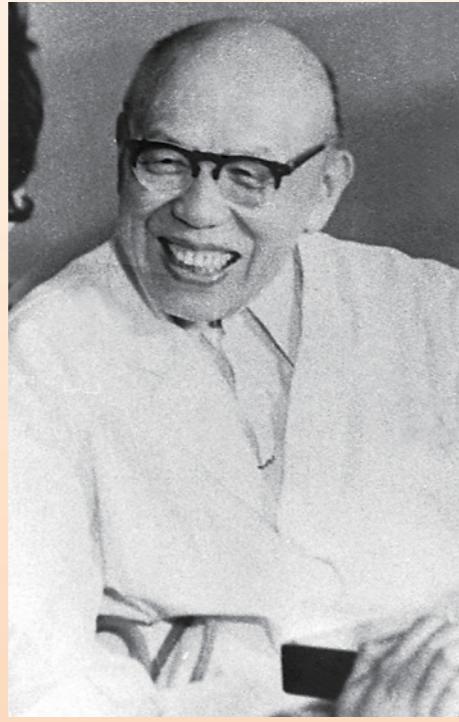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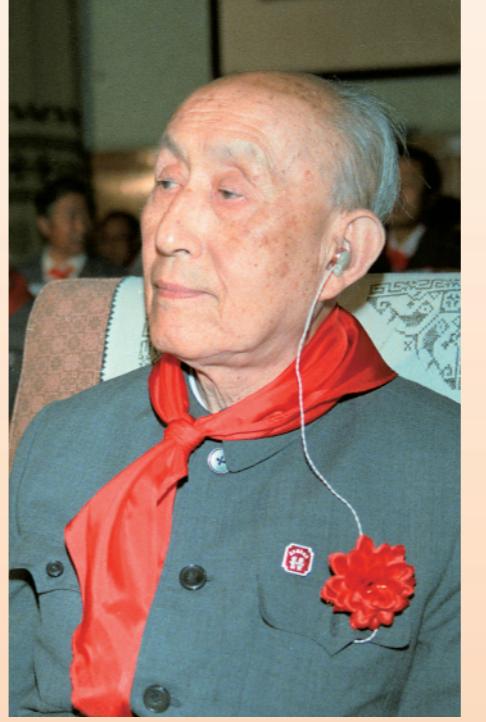
中国普通外科奠基人曾宪九。



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



热带病医学研究奠基人钟惠澜。



中国儿科奠基人诸福棠。



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新华社资料片

本报记者王京雪

1921年9月16日,在今天的北京东单王府井一带,新落成的北京协和医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秋日暖阳下,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间,来自世界各国的上百名学界精英与各界名流共同见证了一家植根中国土壤、“志在世界一流”的现代医院的诞生。

这家医院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医院之一。100年后,闹市之中,它的碧瓦飞檐依旧,而每块青砖的纹理内,都被刻入一段关乎生死进退、宏大细微、科学与人文的动人印记。

“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医学史。”新中国现代医学的“凌烟阁”中,挂着一幅幅协和医者的画像——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中国儿科奠基人诸福棠,中国普通外科奠基人、危重病医学开创者曾宪九,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吴英恺,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吴阶平,中国内分泌学奠基人刘士豪,中国临床癫痫及脑电图学奠基人冯应琨,中国风湿病学奠基人张乃峰……

一个世纪以来,这里坐镇着一代代医学名家,接诊过许多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的疑难重症患者,保存了从1921年至今的400余万册病案——无论是孙中山、梁启超、林徽因等历史名人,还是无数前来就医的百姓,几乎所有患者的医疗档案都被尽数保留,共同构成了一家独一无二的人类医学档案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北京协和医院建院100周年。回首百年,北京协和医院亲历、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提升以及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沧桑巨变。

用挂在协和学术堂院史陈列馆前厅的《协和赋》里的句子来概括,它“与党同龄,与国共运,与民长在,与时俱进”,“坐拥京师繁华地,长奏救死扶伤歌”。

到人民中去

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开业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潮勃兴的年代。

“东亚病夫”的帽子,从鸦片战争以来,就被屈辱地戴在中国人头上。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痛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为甩掉“病夫”的帽子,几代中国人投身于为两件事奋斗:一是“医国”,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二是“医人”,让中国人拥有健康强健的体魄。

五四运动后,伴随科学精神的弘扬,现代医学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协和的诞生,适逢其时。

协和开幕典礼期间,时任长沙湘雅医院院长胡美,在发言中用数字直指中国当时触目惊心的医疗现状:1921年,美国每720人有一位医生,而中国则是每12万人才有一位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

一道巨大的难题摆在“医国”“医人”者眼前:怎么才能让亿万中国人民病有所医?

事实上,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群众仍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1949年,全国仅有3670个医疗机构、8.5万张医疗床位,每千人口医疗床位数量0.15张,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量0.93人。

如今的人们已很难想象,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是世界上人均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当时中国每5个新

生婴儿就有1个会夭折;各种传染病肆虐,药品供应不足,医疗器械依靠进口……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1951年1月20日,协和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协和人也投入了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医疗卫生建设事业。

“过去三十多年,我从‘协和’窗内看祖国,炮声愈响,我把窗户关得愈紧。这一回,什么动力叫我自觉自愿地打开‘协和’的窗户,看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呢?……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三十多年紧闭的窗户。”1952年9月,时任协和妇产科主任、后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

同月,全国各地的援藏医疗队共同组成了西藏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所现代化医院——拉萨市人民医院,这是今天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前身。协和胸心外科专家徐乐天作为新中国的首位进藏医师,参与了组建工作。

1965年6月,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由黄家驷、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英恺、刘士豪、周华康、冯应琨等协和各科顶尖专家组成的农村巡回医疗队奔赴湖南湘阴。张孝骞当时已68岁,仍主动要求下乡。

这支“协和梦之队”在将近4个月时间里,救治了3万多人。治病之余,他们还开办医学班,培训农村医生,一起编写农村卫生员培训教材《农村医学》《农村卫生员课本》和卫生科普读物《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

对于这段经历,林巧稚说:“16年来,我从一个40多岁的壮年到60出外头发斑的老年,从在协和医院的玻璃窗里淡淡地看着人群,到打开协和医院的玻璃窗,走到了农村广阔的天地,为广大农民送医送药……从农民兄弟的渴望与感激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他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我们……”

到人民中去。此后几十年,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国家队”,协和人的脚印遍布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抗震救灾的一线医疗队,对口支援的基层医疗队,新时期的援疆、援藏等国家医疗队……他们的身影是中国千千万万医护人员的缩影。

可以清晰地看到接力棒的传递。2015年,北京协和医院受命牵头完成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任务,至今已派出7批66名骨干入藏工作,无间断地为当地医院提供“造血”式援助。

参加首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协和检验科副主任邱玲,今年入选了由中宣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的2021年“最美医生”。

在协和人参与创建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邱玲带队用3年时间,让医院检验科通过了ISO14189评审,让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藏区从此有了符合国家标准的临床实验室。

结束援藏前,邱玲来到献血点,她在朋友圈里写道:“在我们即将离开时,也许还可以为我们的亲人献上我们的热血。”

把患者装在心里

在百年协和,流传最久、最动人的故事,都是有温度的。

“在这个‘医学殿堂’,备受尊敬的‘大’医生,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在庆祝医院建院百年的致辞中这样说道。

走进院史陈列馆,人们能看到几个协和

人最熟知的故事——

协和内科老主任张孝骞,座右铭是“戒、慎、恐、惧”。他的名言是:“患者以生命相托,我们如何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院史馆里展示着他那些早已成为协和传奇的“小本本”。尽管学术地位崇高,张孝骞生前却没出版过独立著作,只留下这样几十本巴掌大小,写满病人姓名、年龄、病情等信息的小本子。与他共事过的医生们说,二三十年前经手的病人,张孝骞也能说出姓名,对其病史如数家珍,仿佛从未离开病人身旁。

“当病人终于康复时,我就会有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会觉得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甜的。”直到85岁高龄,张孝骞仍然坚持一周两次门诊、4次查房。耳朵不好使了,他把听诊器的管子剪短,弓下腰听。腿脚不灵便了,他拄着拐棍去病房。

妇产科老主任林巧稚的床头柜和电话也陈列在展厅中。她说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她床头的电话永远连接着病房。“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看病人不是修理机器”是她经常对后辈们说的话。

20世纪70年代,林巧稚时隔多年重访美国。回国后,她对医务人员们说,“那里的医疗技术很发达,但我担心这些仪器设备可能成为医生和病人的障碍。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的床边去。”

一生未婚的林巧稚,亲手接生过5万多名婴儿,每个孩子的出生证上都写着:“LinQiaozhi’s Baby”。其中,有个姓名栏填着“袁小孩”的孩子,后来取名叫“袁隆平”。

外科老主任曾宪九1984年写给病人的信也被收藏在这里。“张贵纯同志,您于9月14日门诊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希望您不要延误。”病人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为胰头癌,放弃了希望,没去复查,曾宪九比自己还着急。

30多年后,已经恢复健康的张贵纯仍记得自己收信后前去复诊时的情景:“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啊,这小同志。”而那时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连从家里走到医院200米的路,都要歇上几歇。

“老百姓选择医院的理由非常朴实,就是看医院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能不能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着想,能不能把他放在心上。”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韩丁说。

早些年,协和开展过“做一天患者”体验活动,医院科主任们亲身体验了患者就医的几个重要环节。其中,体验挂号的科主任凌晨5点赶到挂号处排队,两个多小时后排到,却已经没号了。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协和陆续优化了全院上百个流程,且至今仍在改进。

2015年以来,协和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手机App,全国各地的患者在家就能预约挂号;新自助机被启用,人们可以少排几次队,在一台设备上集中完成挂号、缴费、打印化验单;医生们科学排班,增加号源,加大周末门诊量;2018年底,协和率先在大型公立医院中实行用身份证取代就诊卡。如今,以身份证、医保卡取代就诊卡的做法已被广泛推广。

去一家医院,就要办一张卡,最后攒了一张卡,易丢、易乱,还容易忘带的现象逐渐成为历史;协和还推出了门诊转诊系统,尽量解决患者连续诊疗需要多科挂号的问题;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2020年5月互联网诊疗上线后,已有1200余名医生开通权限,累计服务6万人次,节省了患者的就医成本;开通线上申请病历复印,足不出户,病历就能邮寄。

到家……

在服务患者方面,100年前,协和建院之初就设置了中国第一个社会服务部,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医院社工,他们帮助病人与医生沟通,协助病人解决种种难题。

现在,协和拥有10支志愿服务团队,500余名志愿者。有人在门诊引领病人就诊,教老人使用医院App;有人工作休息间隙,拿起乐器为患者演奏乐曲……

“是什么在支撑着协和人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而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呢?”在医院为献礼建院百年编写的书中,协和人说,“是确保公立医院公益性这一制度建设理念引导的结果。”

随着中国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医疗健康需求也从病有所医,逐步转向良好的就医环境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2015年起,国家卫健委在全国医疗系统持续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就医感受。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看病就医问题,远非一家或几家三甲医院能够承受的。“十三五”期间,北京协和医院累计收治门诊急诊病人1700多万人次,其中近六成来自外地,平均日门诊量达到1.3万人次,医院每天都在“超负荷”高速运转。

除了不断改进流程、提升服务,尽力满足病人需求,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让人们能够就近享有公平、持续的医疗健康服务。

“看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这个工作要在‘十四五’期间起步。研究改革的堵点在哪里,结合本地实际继续探索。”谈到下一步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已提出明确要求。

看别人看不了的病

协和内部有句话,叫“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出别人出不了的成果”。作为国家卫健委指定的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协和的医疗水平、科研水准,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医学的高度。

从1921年带着“世界一流”的目标建院至今,协和创下过许多“第一”,在世界上发出了中国声音,提供了中国方案。

例如:1942年,刘士豪、朱宪彝关于“肾性骨营养不良”的论文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上,这是国际上首个由中国人命名的疾病;上世纪50年代,以宋鸿钊为首的研究者们将一度被称为“癌王”的绒癌从死亡率90%转变为根治率90%。宋鸿钊提出的绒癌临床分期法,被接受为国际统一分期标准;1959年,吴阶平设计了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术,十余年后,被欧美书籍和杂志作为最新手术方法介绍到西方;上世纪80年代,由史轶黎牵头,协和9个科室合作,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垂体卒中后有完全和部分破坏两种结果的概念及治疗原则,将垂体瘤诊治提高到国际前沿水平……

近些年,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协和不断涌现,这些成果和技术创新,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减轻了病痛,有的还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

在北京协和医院,有个传承了百年的传统,影响了整个医院的临床诊疗体系和对疑难病、罕见病的高效诊治——“内科大查房”。

每次“大查房”,内科各个专科大小的医生几乎全部到场,还会邀请放射科、病理科、检验科、外科等科室参加,参加人多在百人以上。针对预先挑选出的单一专科难以完全把握的疑难罕见重症病例,多科专家围着一个病人各显其能,共同分析病情,提出治疗方案。

这一方法被进一步发展,协和目前已设立27个疑难病会诊专家组,“大查房”文化孕育出覆盖全院的疑难疾病多学科会诊,为疑难重症和罕见病患者分忧解难。

例如,一位20岁的患者,记忆减退、定向力障碍、睡眠障碍、癫痫发作,还有严重的内分泌紊乱,贫血、皮疹等症状。协和用3天时间完成了在常规门诊需要用一个多月的系列检查,召集了3次10余个部门参与的多学科会诊,组织急诊手术,为患者完整切除了一个约15×20厘米的巨大肿瘤。这一罕见的肿瘤,比当时国际文献报道的最大肿瘤还要大1/3多。

新冠疫情暴发后,北京协和医院派出的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最早到达、最晚撤离,救治了众多危重症患者。他们将协和多学科会诊、疑难病例讨论、三级查房等经验和制度带到了武汉,大大降低了极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

协和人还总结了一线抗疫救治经验,形成新冠肺炎诊疗建议方案,被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指南引用,其英文版给世界各国医护人员提供了重要参考;协和护理团队总结重型、危重型患者护理规范,成为国家规范的基础蓝本;协和青年骨干同4大洲20多个国家进行了国际远程连线,全球累计收看人数超过1亿人次,为世界贡献了抗疫的中国经验……

有些东西,的的确确穿越了时空,像不朽的老树,屹立至今又抽出了新芽。

遥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每年因黑热病丧生的人数高达几十万,协和医生钟惠澜为研究黑热病,深入病区,自己也不慎染病,边忍受病痛边记录体验,为诊断提供临床参考;全面抗战爆发后,协和医学院生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赴武汉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得到众多协和医生及医学响应;抗美援朝期间,219名协和医护人员报名参加志愿军手术队,吴英恺等17人前往战争前线……

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疾病痛楚,也比任何人都明白医者担当。

100年过去,许多事变了。一个民族从“东亚病夫”成为“东方巨人”;中国人从缺医少药、病无所医,到有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有了建设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有了抗击疫情的中国力量、健康扶贫的中国模式、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制造……

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77.3岁。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02万余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910余万张,孕产妇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00/10万下降至16.9/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至5.4‰。

如今的北京协和医院也变大、变新了,逐渐形成有4个院区、总建筑面积61万余平方米的协和医学城。

但在变化的另一面,也有些事没有变、不会变,一如星空永恒。

参考资料:
常青《协和医事》
北京协和医院《碧瓦丹心百年间》